

# 從歷史的後視鏡中 重新調整前進的方向



本刊執行長 ■ 丘亮實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曾任僑選立法委員，印尼歸僑協會理事長，現任中國國民黨評議委員等要職，現已退休。

本會成立於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距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任何一個社團歷經了半個世紀的慘淡經營，必然有許多訴說不完的故事，本會走過了歷史的滄桑，也迎來了狂飆的年代，在歲月流轉的變遷中，印尼華僑的經歷是如此憂患切深，歷史的步履是那麼辛酸沉重。

公元一九四五年印尼宣佈獨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國卅八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這三股政局的變化，其中糾葛著千絲萬縷的歷史情結，網繆著多少的民族恩怨，直接間接衝激著印尼華僑社會，發生了一次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以後，印尼華僑的處境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動盪不安之中。

一九五九年印尼蘇卡諾總統頒布了一項第十號法令：規定印尼全國縣以下地區外僑經營的小商店營業准字，有期限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許多僑胞的生計頓時陷入絕境，走投無路，萬般無奈之下，只得把經營了幾十年勞碌半輩子的家業結束變賣，攜家帶眷，遲遲其行，三步一回頭揮淚離開了印尼，回到台灣或中國大陸。逃難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今後又得重新過起飄泊無定的生活。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一批一千四百多名（其中二百多名是回台升學的僑生）的僑胞搭乘日本貨輪「興安丸」回到台灣，這是第一批大舉逃離的印尼華僑。在這之前，已先後有不少印尼僑生陸續回到台灣升學，也有一些零星散戶遷居台灣。隨著印尼排華情勢日益惡化，無時或已的險惡情勢，回台定居的印尼華僑人數越來越多，散居台灣各地。初來乍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茫然無所適從，今後他們所面臨生活起居的諸多問題，亟待施以援手協助解決。

於是，原先在印尼時期就是社會賢達人士，本著同是天涯淪落人，人饑己饑的胸懷，籌商發起組織同鄉會，以發揮同僑互助精神，協助歸



僑解決困難，並協助政府辦理有關印尼歸僑安置和謀生等問題，於是組成了「印尼歸國華僑聯誼會」，其後更名為「印尼歸僑聯誼會」。最初的會所是借

用盧佐興先生在羅斯福路三段的薯粉廠。這之

後悠悠二十五年歲月前後搬了十個地方，這種無立錐之地，居無定所，東遷西徙極不安定的處境，嚴重妨礙了會務的推展，長此以往，終非了局。直至民國七十三年鄒育庭先生擔任第七屆理事長兩年期間，他深感欲求會務之推展，勢必要先有固定會所，才能事半功倍，克盡事功。於是他大膽提出購置會所之議，身體力行，劍及履及，不辭辛勞，奔走各方，終獲海內外同僑熱烈支持響應，踴躍捐輸，募得新台幣4,850,634.元鉅款，成績斐然。有了基金後，著手物色會所時，考慮到當年印尼歸僑多落腳在中和鄉（還沒有升級為中和市），且房價也較台北市便宜，於是就在北台縣永和市永亨路二至六號七樓購得現在之會所，從此我們有了自己的家，這是一項振奮僑心的喜事。

翌年，依政府法令，本會再次更名為「台北縣印尼歸僑協會」，這一切都標誌著本會正朝前邁進一個新的里程碑，積極推展會務，開創未來新局。這時當年回台升學的印尼僑生也紛紛自各大專院畢了業，學有專精，步入社會，本會尤其注意新陳代謝的世代交替，積極網羅年青新人參與會務，共謀印尼歸僑的福利。

今天欣逢本會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本著以歷史的後見之明，回顧過



去，以策來茲，不揣淺陋，略述中國人移居印尼四百多年來的辛酸歲月，聊作野人獻曝。

當初中國人之所以離鄉背井遠渡重洋到海外各地謀生，皆因中國內地戰亂頻仍，動盪不安，民不聊生，而廣東和福建這兩個沿海省份的鄉下，山多田少，謀生困難，只得忍痛辭別雙親，遠離故鄉過番到南洋來。初來乍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語言不通，習俗不同，在草澤荒煙中艱難邁步，一路驚險曲折，飽受困厄折磨，秉持著中國人吃苦耐勞，勤奮工作，節衣縮食的本性，這一段路程走得何其艱難。如是者經過多少暮雨朝風，多少個暑往寒來才站穩了腳跟，落地生根，而後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儘管當年海禁未開，交通不便，而中國人卻比荷蘭人早一步來到了印尼，算起來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

中國人不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丟不掉家鄉的習俗，不肯入鄉隨俗，不能真正融入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尤其不願學習當地的語言。此外，中國人在海外各地的時間久了，人數愈來愈多以後，自成聚落，爲了同鄉人彼此之間的相互照應，互相幫忙，就有了同鄉會的組織，如梅縣同鄉會、蕉嶺同鄉會、大埔同鄉會等，而後又由同鄉會發展出同省的所謂廣東同鄉會、福建同鄉會和海南同鄉會等，其後又由同鄉會擴大到姓氏的宗親會，如河南堂丘氏宗親會、江夏堂黃氏宗親會和西河堂林氏宗親會等，經過了這一連串的演進，這些同鄉會和宗親會都先後組成了，從此彼此之間有了照應，不再那麼單薄無助。然而這些名目繁多架床疊屋的組織，說白了也



只不過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牢不可破的宗族觀念封建意識的海外版，狹隘的地域觀念十分濃厚的小團體，各自為政，顯有非我族類的排他設限。

中國人千辛萬苦漂泊到了異鄉，卻不懂得因時制宜，切實注意自身的處境，破除省籍姓氏束縛，精誠團結，互相扶持，殊為遺憾。有識之士，有鑑於此：認為個別的同鄉宗親小團體固無可厚非，親不親故鄉人，較具親和力。然而，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把這些個別性的同鄉小團體聯合組成一個更大的團體，才能發揮更大的力量，為華人謀求更大更多的福利，於是才有了華人較具規模的社團組織，這就是在各地華人社會中常見的「中華會館」、「中華總會」或「中華商會」等，名稱雖異，性質卻同。象徵著華人意識的覺醒，開始懂得團結才有力的重要，一旦華人的權益受到侵犯時，才有力量去維護與人交涉；即便是自己人發生了嚴重爭執時，也才有了可以仲裁的機構，綜理著華人自己的事務，協助華人與當局辦理各種事務，儼然已具有政治和商務機構的性質，是華人精神保壘的象徵。近世以來，祖國歷次的革命和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如：推翻專制腐敗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八年對日抗戰等，各地的中華總會或中華會館，熱烈發動僑胞出錢出力，踴躍捐獻，支援祖國抵禦外侮強權，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隨著華人在異鄉生根落戶，成家立業，結婚生子，子女長大以後的教育問題，頗費周章。荷蘭殖民政府在其統治印尼的三百四十多年期間，除採取一貫的剝削、榨取、壓迫等殖民既定模式外，對於華人和印尼人的教育問題從不理會，採取愚民政策，深恐教育普及，人民有了知識以後，反



而會引來反叛動亂。而專為荷蘭人子弟設立的學校，在一九〇八年以前是完全禁上華人學童入學的。卻又因為華人一向有勤奮節儉、刻苦耐勞的美德，在經濟上已漸有舉足輕重態勢，為攏絡華人作為其榨取更多財富，故示優厚，入學條件略有放寬，但仍限制十分嚴苛，必須是家境富裕，有社會地位或在政府機關服務的公務人員子弟才准予入學。

此外，中國人在海外謀生，可以忍受各種艱難困苦，逆來順受，能屈能伸，隨遇而安。然而，就是不願意接受異族的文化教育，生怕被同化了。因此，一些比較寬裕的家庭，寧願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家鄉去接受祖國的教育，經過幾年後再把他們接出來。這種情形，也只是少數家境較富裕的人家可以辦到，對於大多數華人來說可就憂憂乎其難。然而，這可不是單一個別的問題，而是關係整體華人的切身利益，不能等閒視之，像這種茲事體大的事體，也只有中華會館才有能力解決。例如：一九〇一年巴達維亞八帝貫的中華學校（八華）和一九〇六年中爪哇直葛的中華學校等，開始時就是以中華總會的名義創辦的。其後爪哇各地華人紛起響應，將原有私塾或義學改辦學堂，例如：椰嘉達廣東同鄉會所創辦的廣仁中學、泗水的新華中學、三寶壟的中華中小學和華英中學、直葛的中華學校等，都是歷史悠久的百年華校，培育英才無數。在短短兩年期間，這種華校、學堂就有二十多間，到了一九一九年，全荷屬各地竟有了二百多所，蔚成一片辦學的興盛熱潮，振奮僑心。也因為荷印殖民政府對華人興學，採放任態度，不過分干預和限制，更因中國內地在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成功，



改朝換代，由滿清王朝換成民國政府，氣象一新，各種新制度、新設施應運而生，原日的私塾義學紛紛改成了新式學堂。海外中國人受此風氣影響，一步跟進，自此以後，華人學校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一日千里，快速成長。

遲至一九四九年八月，椰加達的印華高級商業學校，仍然還是以椰加達中華商會的名義創辦。有了前面所舉的幾個華校創辦成功事例，凡有中華會館存在的地區，莫不比照這樣的模式辦理。海外華校所扮演的角色，除了開宗明義要授業解惑，更要傳授這些土生土長的華僑後裔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才懂得慎終追遠，不致成為數典忘祖的不肖子孫。

一九四二年日軍南侵，在佔領印尼三年八個月期間，強迫封閉了全印尼所有華校，這不啻是印尼歷史上一大轉捩點，更是華人社會的一大轉折，此一轉折，除華文學校被迫停擺了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軍撤出印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宣佈獨立，至一九四九年荷蘭正式移交政權給印尼。值此之時，祖國八年對日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國際地位躍昇為五強之一，不但中國國內萬眾騰歡，海外僑胞亦莫不興高采烈，吐氣揚眉，精神上獲得極大鼓舞，僑胞空前團結，不分省籍，萬眾一心，契機千載難逢，全印尼各地華校，紛紛復辦，或創辦新校，以應情勢需要。此後十年期間，是印尼華僑教育史上的黃金時期，朝氣蓬勃，氣象萬千。

然而曾幾何時，繁花盛景，曇花一現，艱苦的八年抗戰，付出了慘重

的代價才得來的勝利，國共兩黨又迫不及待在國內重燃戰火，戰況激烈。不旋踵，中共佔據了大江南北的半壁河山，隨即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印尼繼英國之後也承認了中共。於是，印尼各地的華僑社會，忙不迭又分裂成擁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左右兩派，壁壘分明，嚴峻對立，兄弟鬩牆，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漫天飛沙走石，形勢急轉直下，原先和諧團結的氣氛，一朝化作雲煙灰燼，蕩然無存。

印尼這個新興獨立的國家，滿溢著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對僑居印尼已有幾百年歷史的中國人，不惜以各種罪名加諸華人，挾怨報復。先是，在宣佈獨立第二年的一九四六年即爆發「文登流血慘案」，這是排華的張本，蘇卡諾掌權的廿年（一九四五——六五）期間，排華事件從未間斷：一九五八年更藉口所謂「巴東革命軍」事件，誣指右派華人援助「叛軍」為由，先以迅雷不可及掩耳的殺手鐮，封閉所有右派僑校、僑團和僑報，逮捕右派華人禁錮監獄或流放荒島。到了一九六六年連左派的僑校、僑團和僑報同樣無一倖免，同歸於盡。緊接著更全面禁止中文流通，要徹底剷除斷絕華人的「根」。每一次發生排華風暴，華人所遭受的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計。無疑的，印尼已成了東南亞排華最頻繁的國家，華人的處境一步跌進了萬劫不復的歷史深淵。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也能坦然面對歷史，痛定思痛，認真檢討，躬身自省，我們是不是真的「夢裡忘了身是客」或「忘了我是誰」，在日常生活、言談舉止等的表現上，逾越了為人作客之道，財大氣粗，生活奢侈，嬌縱放縱，不可一世，令人側目而種下了禍根。

時序進入了一九八八年，印尼當局已感受到中國的崛起和其國內現實環境的變化，世界上有十三億人口使用的中文，是聯合國公定的正式工作語文，正受到世人的重視與矚目，世界各國的人民掀起了一股學習中文的熱潮。臺商在印尼的大量投資，需要大量中文人才，加上電腦無遠勿屆的推波助瀾，今後誰若對中文採取蔑視的態度乃至於禁止使用的荒謬舉措，都是昧於事實的不智行為。於是，印尼政府不得不面對現實，順應時代趨

勢，逐漸解除禁錮了三十二年中文的禁令，准許中文報刊的出版和有條件地設立三語學校。印尼政府之所以對中文開放，與其說是顧念長久以來華人對印尼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繁榮作出了貢獻，而作的善意回應，毋寧是基於自身現實問題的考量，才是事實。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的人民前往觀光或經商的絡繹於途；台灣和大陸的兩岸情勢也發生著微妙關係，隨著台灣方面於一九八八年開放老兵回大陸省親，台商也大批西進大陸投資設商廠後，國共兩黨經過半個世紀的宿怨，也漸行漸近，一笑泯恩仇；一邊是欲拒還迎，一邊卻是欲做還差，終於歡然握手，揭開了破冰之會的序幕。畢竟政黨或地域省籍的鬥爭是一時的，中國人國家民族大義才是永久的。如今世紀已交了班，當歷史潮流轉變了方向，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時。不論歸僑和現居印尼的華人，均應然幡憬悟，審時度勢，必須從慘痛的歷史中吸取教訓，擺脫歷史的偏見，走出歷史的迷宮，不能再讓歷史重演。我們尤其要摒除不合時宜、不切實際左右兩派的意識型態，及時改絃更張，改變心態，化除成見，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審慎整合出一條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方向。

